

结合型与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的共构

——一项基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行动研究

马 烨¹, 王 颖²

(1. 北京城市学院 公共管理学部, 北京 100094; 2.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 立足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设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项目, 通过与 H 县 H 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工作团队的共同行动, 探索如何基于理论工具、采用何种实践模式发展搬迁群众的社区社会资本。研究表明, 社会工作介入可藉由社会心理恢复、邻里关系建设发展结合型社区社会资本, 以社区参与引导、社区能动性活化发展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是结合型与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循序渐进、双向互动的增长历程, 也是信任关系、关系网络和社区共识 3 个因素彼此作用、相互依存的累积历程。随着重建搬迁群众彼此的信任关系、重构在社区中的关系网络、重塑互惠共享的社区共识, 发展其社区社会资本, 形成“人社配适”的新社区共同体, 最终在搬迁群众生活品质的提升中使他们逐步融入安置社区, 并且在整体社区福祉的增进中使得新环境更适合他们生活, 真正实现“从搬得出到稳得住”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后续工作目标。

[关键词] 易地扶贫搬迁; 社区社会资本; 行动研究

[中图分类号] G 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3) 06-0025-12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发展社区社会资本

脱贫攻坚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工程。为逐步缓解和消除贫困, 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 其中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脱贫攻坚战略的“头号工程”之一, 主要是将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物质资源匮乏以及严重缺乏生产生活条件地区的贫困群众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 并通过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调整经济结构和拓展增收渠道, 从根本上解决“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困境。贵州省是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最早开始试点运行的省份之一, 也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规模最大的省份,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累计建成安置点

943 个、住房 45.6 万套, 累计完成搬迁入住 184.5 万人^①。为切实解决好“搬出来后怎么办”的问题, 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 贵州省委印发《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意见》及 7 个配套文件, 围绕搬迁群众社会身份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 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扶持政策和配套机制。

尽管政府致力于帮助搬迁群众解决户口迁移、社保低保、就业创业、求学就医等基本问题, 但是对于安土重迁观念深重的中国老百姓而言, 远离故土、被动迁移至一个陌生环境, 居住模式和生活习惯被迫改变, 情绪心理和人际关系亟待调试, 而原本紧密的亲朋、邻里、宗族、村社网络的解体, 加剧他们新环境的融入和新身份的适应问题。长此以往, 不仅对于搬迁群众可能会产生“搬得出”但“稳不住”

[收稿日期] 2022-07-12

[作者简介] 马烨 (1986—), 女, 浙江湖州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儿童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管理研究。

① 数据来源于“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贵州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 25 场: 易地扶贫搬迁, 2019 年 9 月 27 日。

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于迁入地也可能会带来破坏和谐稳定的负面影响。如何因应搬迁群众在融入与适应方面突出的问题与需求,是他们能否从“搬得出”向“稳得住”转变的关键,也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重点之一。若要实现此目标,则需要各个领域、多方力量的协同参与。

社会工作被认为无论在理念还是在方法上,在脱贫攻坚战略中能够发挥专业优势与功能^[1],然而,现有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较为稀缺。郑夏从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扶贫精准性、达到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治理初衷、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对象的需求得到满足等方面,阐述了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扶贫搬迁的必要性^[2]。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交流平台搭建、各方面资源链接、专业方法引入、各方力量集结、社区活动开展等途径,采用个案工作和社区工作等方法解决搬迁群众所遇到的困难^[3-4]。尽管目前的研究强调了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扶贫搬迁的重要意义,并且对途径与方法等进行了讨论,但是侧重解决搬迁群众个人或家庭层面的实际问题,且缺乏具体行动与实证研究,因而介入效果值得商榷。

社会工作与其他专业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务的重点同时兼顾个人与环境,以及其间的互动,即协助个人适应周遭的生活环境,以及改造环境使之更适合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工作的生态观点认为,服务对象的问题源于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交流所引起的系统落差或失衡,适应是生态观点的核心概念,指的是有效运用栖息地中资源达至目的的过程,而要适应既要重视个人的发展又要重视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实现个人与环境成功交流,即为适配(goodness of fit)^[5-7]。对于搬迁群众而言,社会工作介入不仅需要帮助他们与迁入地积极交流以逐步融入新环境,也需要促进迁入地趋于适合他们的生存和发展。

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是个人的生活品质及所处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的必备要素^[8]。在移民研究中,社会资本也被认为能够实现个人和社区在搬迁后的恢复与发展,如在纠纷调处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情绪支持、实质协助、

资讯交换,不仅有助于移民更快更好融入迁入地环境,而且有助于促进迁入地社区可持续发展^[9-12]。搬迁群众作为移民的一种,若要使他们能够在生活品质的提升中逐步融入安置社区,并且在整体社区福祉的增进中使得新环境更适合他们生活,真正实现“稳得住”的目标,发展搬迁群众的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言自明。而问题的关键是:究竟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过程中,应如何发展社区社会资本?从社区治理的角度,国内学者从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社区协商民主机制、丰富社会关系网络、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方面,指出发展社区社会资本的多种途径^[13-16]。而这些途径是否适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各种方式方法应如何结合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均是可进一步通过行动探讨的议题。因此,本行动研究立足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设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项目,旨在通过与H县H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工作团队的共同行动,探索如何基于理论工具、采用何种实践模式发展搬迁群众的社区社会资本。

二、文献回顾

Hanifan 首创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一词^[17],而直到 Jacobs 将它用于解释都市生活和邻里关系时,社会资本的理念开始被广泛使用^[18]。发展至今,学术界普遍认为 Bourdieu、Coleman 及 Putnam 等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最为重要。Bourdieu 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总和,这些资源通过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相互熟悉与认可的关系,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网络,能够给予个人或团体支持。”^[19]他视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能够共存互惠,即强调社区内各种资本相互依存的重要性。Coleman 认为,个人不是单独存在于社会的实体,而是与其他人形成某种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可以促使目标实现并且动员更多所需的资源^[20],因而在他的诠释中,强调社区中人际及团体间关系网络的重要性,通过关系网络交流互动能够建立信任关系与社区共识。Putnam 认为,社会资本是包含规范、信任和网络的社会组织特

征,促使参与者能更有效地合作及追求共同目标^[21],他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其本质是为大众谋福祉,由此在社区中,社会资本的累积应能够影响社区成员的整体福祉。上述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理解各有侧重,例如 Bourdieu 强调各种资本相互依存, Coleman 强调人际与团体之间的关系网络, Putnam 则强调公共物品,但是这些概念仍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即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基于信任的关系、共同的规范形成的关系网络而进一步发展^[22]。由此,本研究所指的社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集体性社会资本,反应了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的建立、关系网络的建构以及社区共识的建设,引发其合作意愿并容易产生集体行动,从而助益社区整体福祉。

究其内涵,研究者围绕信任、网络和规范三大社会资本要素,分述如下:(1)信任。Putnam 认为,信任最容易由水平连结以及自组织中产生,而且比垂直连结的组织更具生产力,所产生的社会资本不仅能够产生一般的社会信任,而且能够激发人们的自愿参与动机及对他人的信任,形成“信任循环”,他也强调规范与网络可以促进社会的信任与合作^[23]。因而,在社区的脉络中,信任可被理解为包含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2个层次,前者是社区成员之间隐含着期望与回馈,以协力或互助的形式呈现,并且实现各自的目标;后者是社区成员与不同团体、自组织的持续互动而形成,这种互动基于共同的目标,也反映了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凝聚力。(2)网络。Lin 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一种镶嵌于网络结构中的资源,参与者通过行动予以取得或使用,网络结构会影响参与者的行为,无论是紧密的或者是松散的,而网络结构是由个人、团体、社区或整个社会等通过关系彼此关联所形成^[24]。而社区中的网络,通过社区成员的互动交往,将他们带入不同的关系网络之中,更有机会接触到所处结构之外的其他网络,所产生的资讯与资源交换相对增加,更容易形成有效的信任与规范,累积社区成员的个人与社区社会资本。(3)规范。Nahapiet 与 Ghoshal 认为,当人们拥有共同目标与期望,能促使个人做出对集体有利的行为,如积极寻求可信任的合作关系,理性创造有助于合

作的文化规范,并整合集体的资源帮助达成目标,而当其拥有规范,又能够促进彼此的信任与网络^[25]。由此,社区中的规范可被视为当社区成员对社区拥有共同目标或期望时而产生的价值理念,能够形成一种共居秩序或社区共识。

本研究认为,信任、网络与规范在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中缺一不可。其中,信任是互动得以发生的基础,网络作为连结发展的通路,而规范则聚合形成社区共识。进一步而言,如将社会资本理论运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社会工作介入,强调的是在行动中重建搬迁群众彼此间的信任关系,重构其关系网络以及重塑其互惠共享社区意识,形成新的“人社适配”的社区共同体。从信任、网络、规范3个要素出发,工作团队发现,H县H街道的搬迁群众存在原有信任关系解体、关系网络脆弱、社区意识缺失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使他们难以融入和适应安置社区的日常生活。(1)就信任关系来说,离开祖辈生活的原乡,自然会产生失落、忧伤甚至愤怒等负面情绪,尤其是部分留守老年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居住的村落,而对于城镇生活的不适应、原有社会交往的断裂等,加剧了搬迁群众的心理困扰,进一步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和邻里关系的矛盾。(2)就关系网络来说,H街道搬迁群众原本即为H县人,只是散居在距离县城较远的山村、偏乡,因此与迁入地语言差异不大,各种文化观念和风俗习惯也与原居住地较为相似。但是,由于搬迁群众包括整村搬迁和零散搬迁2种来源,尽管在原居住地的亲朋、邻居大多一起搬迁,但是因以抓阄形式迁入不同单元楼栋,平日的联络、走动并不像在原居住地那样频繁。同时,由散居变为“上楼”的居住形式,使得搬迁群众难以结识社区中的新朋友,甚至连邻里之间的相识相熟都较为困难。(3)就社区共识来说,一方面,社区的共居秩序亟待重建,如部分搬迁群众曾以种植水稻、蔬果,养殖禽类、家畜等作为生计来源,而搬迁后一小部分搬迁群众在自家阳台甚至楼道等公共区域养鸡养鸭,住在一楼的则拔除了家户前的景观植物,种上了辣椒、折耳根等当地蔬菜。然而,公鸡打鸣影响了邻居的作息,种植的蔬菜可能丢失,高层居民对一楼住户不满,等等,为引发邻里之间的矛盾埋下隐

患。另一方面, 尽管搬迁群众已迁入户籍, 完成了从农村户籍到城镇户籍的转变, 但是多数搬迁群众依然认为自己还是某某乡人、某某村人, 而不是H街道的“城里人”, 可以说并未形成对新设街道与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此外, 在分类上, Gittell 与 Vidal 将社会资本区分为结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与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 前者是指基于一种独特的认同, 主要由同质性的个人所形成, 彼此有紧密的接触, 且具有强烈的相互承诺, 如家人、亲友或邻居; 后者主要由异质性的个人所形成, 连结较为疏远, 如社区中的团体或自组织^[26]。尔后, 超越阶层或社区的关系得到关注, 被称为连结型社会资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27]。黄源协等认为这种分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系统观, 并将之置于社区脉络中进一步论述, 若依网络关系的紧密度而言, 结合型社会资本是互动较为密切的非正式直接网络的关系; 桥接型社会资本则是社区成员跨越非正式直接网络, 与社区其他人或团体之间的互动; 连结型社会资本更是跨越社区界线, 与社区外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互动, 这种互动对社区取得外部资源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28]。其中, 结合型社会资本与桥接型社会资本对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有更直接与深远的影响, 通过影响他们在社区内部的信任关系、关系网络和社区共识, 对社区社会资本的累积有相当程度的作用。综合来看, Gittell 与 Vidal 所强调的结合型社会资本较属于微观层面, 对于搬迁群众而言, 影响此类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有个人情绪和心理状态, 家庭成员的互动如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以及与邻里之间的交往等; 相较于结合型社会资本, Gittell 与 Vidal 所强调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则较属于中观层面, 对于搬迁群众而言, 影响此类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有他们与社区的互动和连结、与社区居民的交流和往来等。

基于此, 本行动研究主要致力于结合型社区社会资本与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 并且在发展中同时关注搬迁群众的信任关系、关系网络和社区共识3个维度, 以作为行动依据, 行动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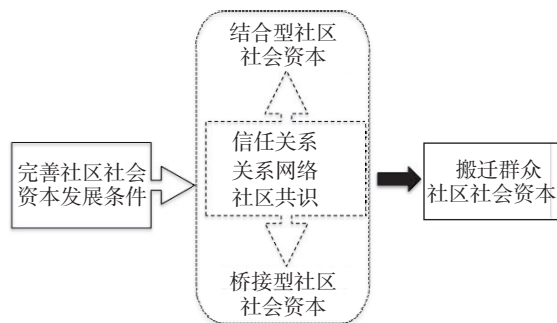


图1 行动前的行动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与执行

(一) 研究设计与周期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是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 也被看作是一种实践赋权增能的助人工作方法^[29], 研究的内容以实务中的行动为主, 在实务中实验想法, 作为改善现状及增进知识的手段^[30]。本研究采取参与范式(participatory paradigm)的协同行动研究(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方法, 以期通过工作团队的共同行动, 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搬迁群众的社区社会资本, 同时希望从行动中共同反思并不断修正行动。因此, 研究的焦点并非理论的验证, 而在于理论指导下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及介入的有效性。依据Susman将行动研究的循环分为问题的发现和界定、行动计划的拟定、行动计划的执行、评估行动的结果、研究发现与反思等阶段^[31], 持续进行本循环过程, 以逐步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结合所依托项目的既定周期, 研究时间自2020年7月起至2021年6月止, 历时12个月, 预计经历4—5个行动循环。图2是本研究在行动前形成的计划历程图, 而实际行动将以评估与反思情况另行修订。

第一个行动循环(2020年7月至8月)的重点是完善发展社区社会资本的条件, 通过建立关系、淬炼团队, 以发展社区社会资本、促进搬迁群众融入和适应为总目标, 与项目各利益相关方达成共识。在此行动循环中, 工作团队前往民政部门查阅资料, 进入社区及搬迁群众家中实地走访, 以及对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做深度访谈, 了解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现状,

在协助社区开展生计帮扶的同时,开展针对留守儿童“四点半”课堂、留守老年人的家庭

访视等基本服务,在条件完善后,即进入第二个行动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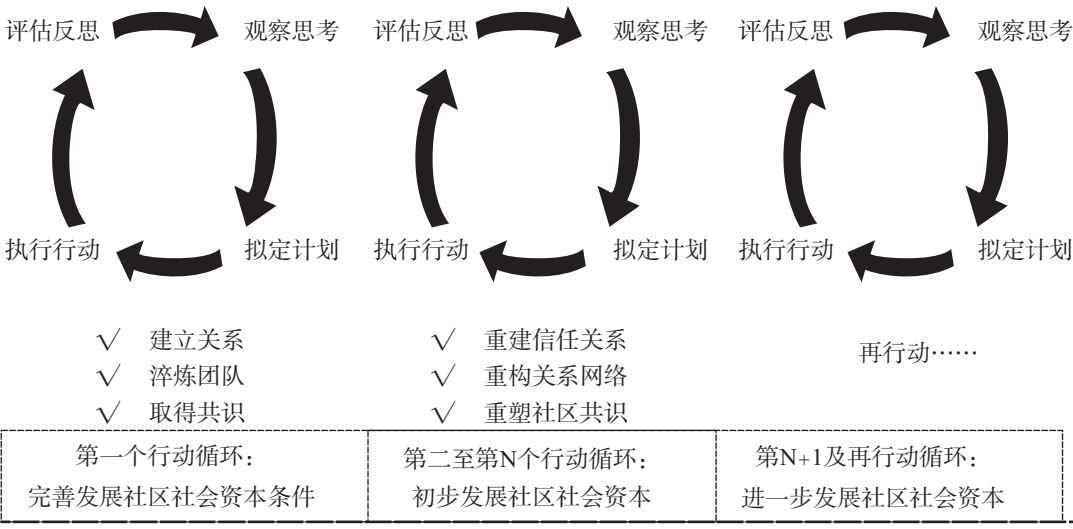


图2 行动前的计划历程图

第二个行动循环从2020年8月开始,在第一个循环的基础上,围绕初步发展社区社会资本开展具体服务和活动。在行动过程中,运用满意度调查表、社会工作者自评报告等工具,结合随机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对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估,且基于评估与反思,共同决策下一个循环的行动焦点。需要说明的是,截至本文成文时,本行动研究经历了初步发展社区社会资本的3个行动循环,即以结合型与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为重点的行动历程,下文将予以具体呈现。本行动研究仍在持续中,以进一步发展搬迁群众的社区社会资本。

(二) 研究场域与团队

2020年初,贵州省出台《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设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项目实施方案》,率先在全省40个县(市、区)的64个少数民族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设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为搬迁群众提供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和志愿服务。本行动研究依托该项目,以H县H街道作为研究场域。H街道下设2个社区,总计搬迁入住2 638户13 592人,其中低保家庭1 632户、留守儿童420人、留守妇女63人、留守老年人62人、身心障碍者59人。辖区内有社区医院1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各1所,中心广场、篮球场各1个,其他基础设施

和公共配套尚在修建中。

H街道的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设置主管1人、社会工作者4人,共同开展服务。在整个行动过程中,研究者作为项目督导参与其中,全面确保服务内容、方法、进度与成效。工作团队以社区社会资本为理论基础和行动框架,厘清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方法、服务场所、可利用的资源等。其中,服务主体为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的主管和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为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尤其是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和身心障碍者等弱势群体;服务方法为综合运用家庭访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方法;服务场所为中心广场、篮球场、服务站和搬迁群众家中等;可利用的资源有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文化资源、政策资源、组织资源等。

四、行动历程

初步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搬迁群众社区社会资本的社会工作介入历时6个月,跨越3个行动循环,研究者将第一个行动循环称为行动前期,时间为2020年8月至9月;第二个行动循环为行动中期,时间为2020年9月至12月;第三个行动循环为行动后期,时间为2020年12

月至2021年3月。3个行动循环的接续时间并不是泾渭分明,表明行动研究螺旋式推进的特点。

(一) 行动前期

1. 行动目标。针对搬迁群众因易地搬迁安置带来的社会心理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情绪心理、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等需求,经过工作团队共同讨论后,决定从结合型社区社会资本发展切入,通过社会心理恢复和邻里关系建设,初步建立家庭内部、邻里之间的信任关系,建构邻里之间的关系网络,并且形成单元楼栋内的共居规范。

2. 行动情形。(1) 在社会心理恢复上,重点针对因适应不良而产生困扰的搬迁群众。一方面,通过个案工作方法,对于有情绪心理问题的搬迁群众,帮助他们舒压减压,疏导其负面情绪;另一方面,通过家庭访视、家庭会议等方式,对于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的搬迁群众,帮助他们调试家庭关系,恢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2) 在邻里关系建设上,重点针对因生活习惯差异等引发邻里矛盾的搬迁群众。一方面,通过个案工作方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邻里之间的矛盾进行调处;另一方面,通过小组工作方法,以单元楼栋为单位,举办邻里联谊小组,鼓励搬迁群众参加邻里聚会,在具有趣味性、娱乐性的活动中,逐渐熟悉同一单元楼栋中的居民,在此基础上,协助他们形成在单元楼栋内的生活契约。如:可以在自家阳台而不可以楼道里种植蔬菜,要将生活垃圾置于垃圾箱而不能随地丢弃等。

3. 行动反思。行动在短时间内改善了搬迁群众的社会心理问题,家庭内部、邻里之间的信任关系得以初步建立,同一单元楼栋中的居民开始在见面时彼此打招呼,邻里之间也开始打开家门相互走动,关系网络得以重新建构,在良性互动、和睦相处中,搬迁群众开始有意识遵守约定的共居规范。如搬迁群众所言,“大家以前不认识嘛,不认识肯定就没话讲,有点小事情搞不定,肯定就容易吵起来……那现在认识了嘛,认识了有话就好好说嘛……”(搬迁群众A);“在

村里的时候,家家户户种,都习惯了哟,来了这里也得种,怎么今天种了辣椒明天就不见了,心里当然很窝火,哪个顺我的辣椒对吧……现在大家都讲好不要在外面种,在自己家里种,那就在自己家里种嘛,大家都种了你送送我我送送你,总比之前都不见了好……”(搬迁群众B);“在外面走走走走,不一天天憋在家里,老头就高兴了,回到家里脾气发的也少了……”(搬迁群众C)^①。可以说,行动前期的目标基本达成。

然而,在行动过程中,工作团队发现,搬迁群众中有部分留守老年人、身心障碍者与同一单元楼栋和其他社区居民的人际交往并未增加。究其原因,有些留守老年人、身心障碍者表示,因为需要上下楼梯,不愿意也不方便常常走出家门,生活物资采买等更是存在困难;有些则表示,出于对城镇生活和社区环境的陌生和恐惧,比如对红绿灯、斑马线等知识匮乏,对如何乘坐公交车等技能欠缺等。此外,随着与工作团队的认识加深,不断有搬迁群众表示,怀念以前的文化娱乐生活,希望能够再次组织起坝坝舞、赛山歌等传统娱乐活动;还有搬迁群众提出,希望能恢复原本的“赶场”“赶集”,藉此与老街坊、老邻居叙叙家常,也能结识新朋友。由此,工作团队决定在前期行动基础上,继续发展结合型社区社会资本,并且尝试发展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

(二) 行动中期

1. 行动目标。针对搬迁群众提出的社区日常生活不便、城镇生活适应不良以及文化娱乐生活匮乏等需求,工作团队决定一方面增进邻里的互助支持,以巩固甚至增强在结合型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成效;另一方面鼓励搬迁群众参与社区活动,以建立在社区范围内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并且在与社区居民的交流交往中,培养其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基本的社区意识。

2. 行动情形。(1) 将邻里互助支持纳入邻里关系建设。通过小组工作方法,在邻里联谊小组的基础上,组织同一楼栋多个单元的留守妇女,以互助支持小组的形式,彼此之间提供力所

^① 来源于笔者对H街道搬迁群众的访谈。

能及的帮助。比如,鼓励她们买菜购物时为其他妇女捎带、在临时外出需要托管儿童时帮忙照看等一系列“随手帮”活动,不仅缓解她们因照顾负担带来的压力,而且扩大其人际交往范围,形成小组内部情绪支持。同时,引导她们将“随手帮”活动延伸至其他有需要的邻里,比如不便出门的留守老年人、身心障碍者等,在此过程中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互动往来。(2)以活动作为吸引搬迁群众社区参与的媒介。通过小组工作方法,针对城镇生活适应不良的留守老年人,举办社区适应小组,帮助他们有勇气走出家门,有方法熟悉社区,有能力结交朋友,有信心适应城镇生活;针对文化娱乐生活匮乏的搬迁群众,举办红色电影、山歌吟唱、民间故事、传统手工等兴趣小组,丰富其闲暇时光,也激发其参与意愿。通过社区工作方法,围绕“爱心赶场”系列社区活动和“喜乐节庆”主题社区活动2条主线开展社区活动。其中,“爱心赶场”分为文化赶场和民生赶场,文化赶场包括山歌大家唱、全家福拍摄以及老友记茶座等环节,民生赶场除了免费理发、测量血压等健康服务,还有低保社保查询、政策信息答疑等内容,搬迁群众可以在每月的“爱心赶场日”得到一站式服务;“喜乐节庆”依托主要节庆举办,如“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庆中秋社区活动、“情暖重阳,爱传万家”老年节社区活动等,以国庆中秋活动为例,通过参与式、体验式的活动形式,引导搬迁群众将小我与大我、小家与国家紧密相连。

3. 行动反思。行动得到了搬迁群众的热情响应,参与互助支持小组的留守妇女之间的信任关系进一步增强,在彼此的支持以及对邻里的帮助中,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得以重构。“真的谢谢她们,有的时候帮我买菜,有的时候还把做好的饺子端给我,来看我的时候还能跟我说话……”(搬迁群众D);“以前我们在村里互相看个娃都是常事,来了这里起初是不认识,也不敢,现在好了,大家一起做活儿,一起看娃,好像又跟以前一样了……”(搬迁群众E)^①。留守老年人在参加社区适应小组之后,熟悉了社区环

境,知道了如何等红绿灯、过斑马线,他们愿意走出家门,也因此结识了新牌友、新茶友;各类兴趣小组则满足了搬迁群众的休闲需求,深受欢迎;每月的“爱心赶场日”使得搬迁群众获得切实服务,“喜乐节庆”活动也吸引了搬迁群众积极参与。在这些活动中,搬迁群众通过频繁的交流,彼此更为熟悉,加深对社区认识,继而培养了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每个月都等着来……能免费量血压、剪头发,真的方便了我们老百姓……”(搬迁群众F);“国庆这个活动好啊,感谢党和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地方住,想都不敢想啊……”(搬迁群众G);“我那些亲戚都羡慕我,他们不在这个社区,我们这个社区活动多,实惠多……”(搬迁群众H)^②。

从搬迁群众的反馈中,可知活动中期目标基本实现,不仅增强了结合型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成效,邻里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关系网络在互帮互助中得以巩固,极大促进睦邻友好、和谐共处,而且初步发展了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具体表现在搬迁群众更广泛的信任关系的建立与关系网络的建构以及非正式支持网络的形成,同时树立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等社区意识,从活动中切身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体恤。然而,工作团队也担忧,仅仅通过活动吸引搬迁群众“被动”参与,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成效是否可持续,尤其是随着社区适应小组等小组活动的结束,组员们是否能够维持以及如何维持在活动以外的联系。与此同时,工作团队惊喜地发现,有一批社区骨干在活动过程中涌现,而一些小组可能发展为社区自组织,也就是说,培育社区骨干、社区自组织等化被动为主动的社区参与,可能成为社区社会资本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由此,工作团队决定在中期行动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

(三) 行动后期

1. 行动目标。巩固之前行动阶段中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成效,在社会心理恢复、邻里关系建设、社区参与引导等服务和活动上,经由社区

① 来源于笔者对H街道搬迁群众的访谈。

② 来源于笔者对H街道搬迁群众的访谈。

能动性活化,通过能力建设培育搬迁群众中的社区骨干、志愿者团体以及社区自组织,鼓励他们主动参与社区活动、承担集体事务,激发社区主人翁精神,进而影响其他社区居民,营造互惠共享社区共识。

2. 行动情形。基于之前阶段的成功经验,此阶段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的做法更为多元,在延续前述做法的同时,针对社区能动性活化的行动主要围绕社区骨干、志愿者队伍和社区自组织的能力建设三大板块展开。(1)以活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和楼栋长作为社区骨干培育的“种子”,针对活动积极分子的能力建设,主要鼓励他们发挥跳坝坝舞、唱山歌、传统手工制作等特长,支持他们形成社区舞蹈队、山歌队、手工队等社区自组织;针对楼栋长的能力建设,主要定期召开楼栋长联席会议,引导他们利用楼栋微信群,打通与搬迁群众直接、便利的沟通渠道,并就相关问题与需求集中探讨解决方法与策略。(2)以大学生志愿者、社区党员志愿者、留守儿童小志愿者作为志愿者队伍建设的“抓手”,动员寒假返乡的大学生组成大学生志愿者队伍,吸收社区、医院和警务室工作人员中的党员以及搬迁群众中的党员建立社区党员志愿者队伍,特别是针对留守儿童,举办小志愿者培育小组,发展一批儿童志愿者。(3)针对社区骨干、志愿者队伍等开展包括需求评估、入户探访、沟通技巧、社区动员、微信公众号推送等多个主题的社会工作基础培训,协助较为成熟的社区自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开展社区活动或志愿服务。

3. 行动反思。一系列围绕社区能动性活化的服务和活动,使得搬迁群众的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得到进一步发展。社区骨干能够承担起一定的社区事务,如擅长农活的主动管理社区“自留地”,热爱电影的从影片的选择、现场的放映“一肩挑”;楼栋长日渐胜任日常工作后,自发组织“最美楼栋”评比,极大调动了搬迁群众的参与热情,成为颇受欢迎的持续性社区活动;大学生志愿者组织的“寒假成长营”,为留守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培养其良好学习态度和习惯;儿童志愿者在社区图书馆开展图书借阅,在社区

活动时维护秩序,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带领下上门慰问留守老年人和身心障碍者;舞蹈队、山歌队等在社区联欢会、新春团拜会上大放异彩。一位楼栋长说:“原来统计什么信息都要一家一户上门,现在在群里通知,大家一回应,省事多了……还不止,群里也都喜欢聊天,你一句我一句,举办活动也是群里说一下,大家都愿意参加……”(搬迁群众I);一位大学生志愿者表示:“这次寒假回来社区可不一样了,热热闹闹的,总有活动,我们自己也在社工帮助下成了志愿者,为家里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感觉非常有意义……”(搬迁群众J);在联欢会结束后,有搬迁群众说:“我们是很能歌善舞的,看到她们(山歌队)把我们的民族歌舞搬到舞台上,非常激动,我也想加入进去……”(搬迁群众K);另一位接受志愿者探访的留守老年人则说:“没想到这些娃娃们过年能来看看我,还给我家里贴春联、窗花,我也过了一个热闹年……”(搬迁群众L)^①。

通过随机访谈和参与观察,结合行动过程性资料,工作团队评估认为,历时8个月、经历3个行动循环后,搬迁群众无论是结合型还是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均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家庭关系重塑,邻里隔阂融冰,搬迁群众从陌生到熟悉,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明显增进;活动参与增多,社区连结加强,自助互助的关系网络明显增强,随着个体之间、家庭之间、邻里之间、团体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不断频繁与深化,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得以稳固;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明显增加,互惠共享社区意识初步培育,为社区社会资本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对民政部门、街道和社区相关工作人员的回访则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行动的有效性,H街道的搬迁群众的“邻里矛盾少”,彼此之间发生口角、纠纷事件明显减少,社区投诉情况也相应减少;搬迁安置社区“精神风貌好”,不仅表现在楼栋内、社区内的环境卫生较好,而且搬迁群众能够主动参与、积极组织各类活动;“留得下、稳得住”,搬迁群众逐渐认识到自己是新社区的主人,并愿意为社区发展尽心努力。可以说,初步发展社区社会资

① 来源于笔者对H街道搬迁群众的访谈。

本、协助搬迁群众适应和融入的行动目标得以实现。

作为工作团队与搬迁群众、社区社会资本理

论与社会工作介入之间的来回对话, 初步发展社区社会资本的行动历程可用图3归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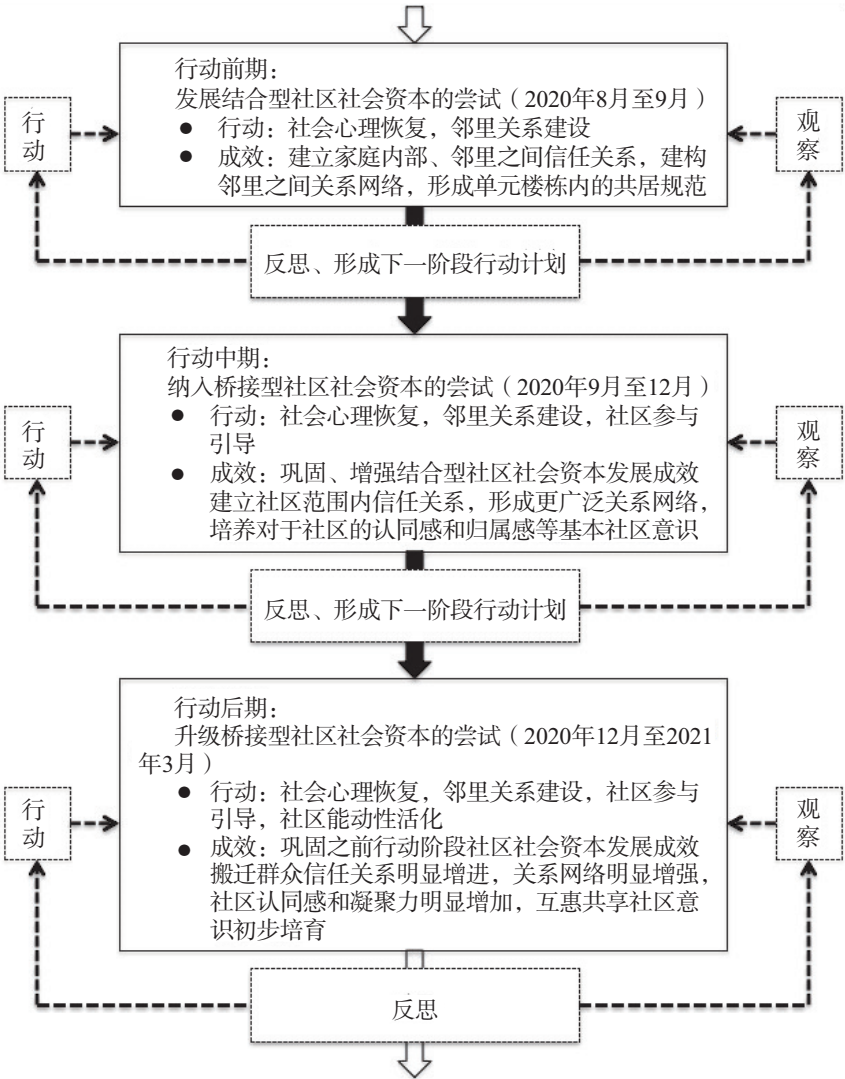


图3 初步发展社区社会资本行动历程图

五、发现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 在社区社会资本理论的指导下, 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优势与资源, 进行合适的服务设计, 在行动中通过持续的观察、反思与评估, 积极修正行动计划, 保障介入的精准性与多元化, 能够有效回应搬迁群众信任关系解体、关系网络脆弱、社区共识缺失等问题, 帮助他们在生活品质的提升中逐步融入安置

社区, 并且在整体社区福祉的增进中使得新环境更适合其生活。在行动历程中的各项服务和活动之间均不是割裂的, 而是围绕信任关系重构、关系网络重建和社区共识重塑三大因素, 这些交织、持续的服务和活动, 增进了搬迁群众在社区内部的频繁互动, 连结成不同层面、不同系统之间的关系网络, 在这样的正式与非正式支持中, 他们自身获得支持、取得资源的能力得以增长, 社会工作介入的功能也从治疗的、残补的, 转为预防的、发展的。

具体来说,将该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中,若要使得介入富有成效,需要结合型社区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循序渐进、双向互动发展,并且兼顾信任、网络和规范 3 个因素及其互动作用:(1) 必须重视信任关系的重建,从恢复家庭内部、邻里之间的信任关系着手,继而逐步扩大至建立社区范围内的信任关系,促进睦邻友好和社区和谐。(2) 必须重视关系网络的重构,从家庭之间、邻里之间的关系网络切入,继而形成社区范围内广泛、密集的关系网络,成为搬迁群众新的自助互助的非正式支持系统。(3) 必须重视社区共识的重塑,这种内在规范并非行政命令,而是搬迁群众在长期、频繁、密切的沟通和互动中形成并进一步扩展的规范,充满在地的人性化和人情味,有助于增进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事实上,三者是彼此作用、相互依存

的,信任关系是关系网络和社区共识的基础,关系网络是信任关系和社区共识的通路,社区共识则使得信任关系和关系网络更为稳固。也就是说,通过社会工作介入,重建了搬迁群众之间积极的信任关系,重构了社区内部紧密的关系网络,在唤起合作价值和创造群体身份的同时,自然重塑了互惠共享的社区共识。而这一切创造或再造了社区社会资本,将能够激发搬迁群众和安置社区连绵不绝的能量,成为其生活品质提升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性动力。在一个相互熟悉、互动频繁、团结互助的社区,根植于搬迁群众彼此信任、互助支持,对互惠共享价值充满认同,在社区事务中积极参与并体现合作精神的社区社会资本,也推动了“人社配适”的新社区共同体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建成(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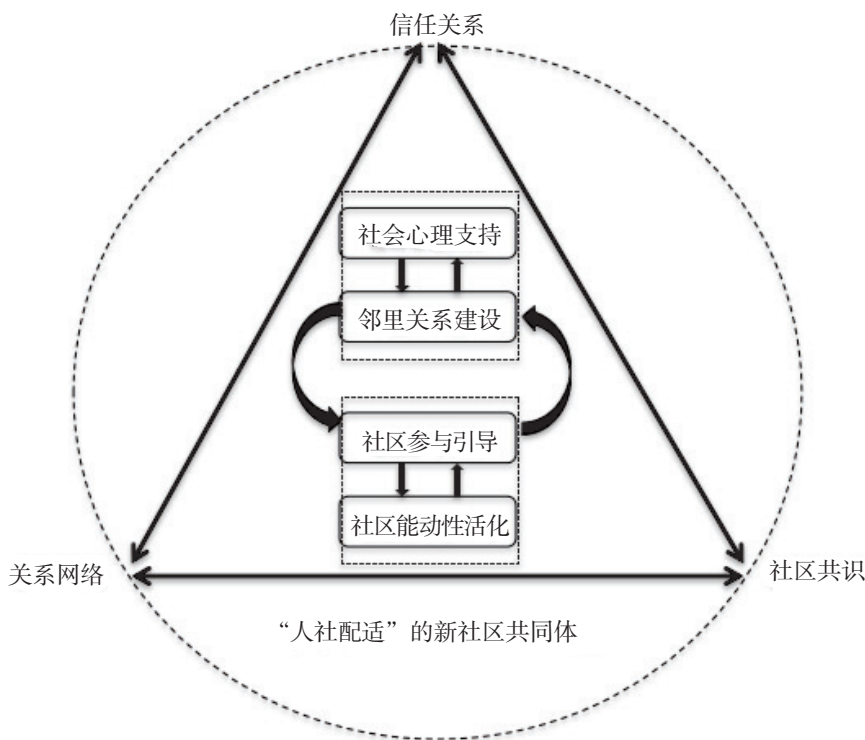


图 4 搬迁群众的社区社会资本发展机制图

H 县 H 街道的社会工作介入远未结束,本行动研究也已进入新的行动历程,在对前述行动历程的评估与反思中,尝试进一步发展搬迁群众的社区社会资本,可能的做法有:(1) 调整服

务重心,拓展服务内容。此前,社会工作介入重点是发展结合型社区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而在新行动历程,将延伸至连结型社区社会资本,如通过“玩转城市”系列社区活动,

以陪伴留守儿童乘坐公共汽车、去超市购物, 组织他们前往博物馆、电影院等方式, 鼓励其走出社区, 进一步融入城镇。(2) 孵化社会组织, 深化可持续能量。巩固并发展现有的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 在志愿者队伍、社区自组织等基础上, 孵化符合实际、切合需求的正式的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组织与管理、交流与培训等工作, 关心照顾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的个人成长和组织发展, 将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 定期为搬迁群众提供诸如陪同就医、互惠购物、关爱探访等便民服务以及治安维护、垃圾管理、社区美化等社区服务, 真正实现搬迁群众参与社区事务、促进安置社区可持续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作为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造福了一方群众。对搬迁群众而言, 搬迁的初衷并非主动的、趋利的移动, 而是被动的、行政的干预。如何协助搬迁群众更好融入和适应迁入地生活, 是关系其是否“稳得住”的重要课题, 可能有无数种探索或者答案。本研究以社区社会资本为理论基础和行动框架, 将 H 县 H 街道作为行动研究的场域, 随着社会工作介入, 研究者试图从工作团队的反思、服务对象的反馈以及对项目本身的观察与思考中, 探索发展搬迁群众的社区社会资本、建设“人社配适”的新社区共同体的可能做法。希望能够藉由本研究, 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后续工作中的社会工作介入提供可供参考的方法和机制。

[参考文献]

- [1] 李迎生, 徐向文. 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 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 [J]. 学海, 2016 (4): 114-123.
- [2] 郑夏. 精准扶贫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搬迁的必要性探究 [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4): 89-91.
- [3] 邓华丽. 基于社会工作视角的易地扶贫搬迁对象社会融入问题探讨 [J].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17 (3): 68-69.
- [4] 宋振玲, 刘铭. “人本中心”理念下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工作介入: 以 H 省 B 县为例 [J]. 法制与社会, 2019 (10): 133-134.
- [5] SEGAL E, GERDES K, STEINER 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fession of social work: Becoming a change agent [M]. Boston: Cengage Learning, 2009: 7-8.
- [6] 宋丽玉, 曾华源, 施教裕, 等. 社会工作理论: 处遇模式与案例分析 [M]. 台北: 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2: 291-300.
- [7] ROBBINS S P, CHATTERJEE P, CANDA E R. Contemporary human behavior theory: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or social work [M]. London: Pearson Higher Ed, 2018: 32-35.
- [8] NEWMAN L, DALE A. The role of agency in sustainable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J]. Local Environment, 2005, 10 (5): 477-486.
- [9] 刘晋飞, 黄东东. 三峡移民社区的整合机制分析: 兼论移民纠纷框架下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J]. 西北人口, 2008 (6): 63-68.
- [10] 许雅惠. 鱼与熊掌: 新移民妇女的社会资本分析 [J]. 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 2009 (2): 1-54.
- [11] 刘芳. 桥接型社会资本与新移民社会融入: 兼论社会组织与基层社区对新移民融入的推动作用 [J]. 学习论坛, 2015 (11): 67-72.
- [12] 雷喆. 移民搬迁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解构与重构: 基于陕南 J 社区的调查 [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9 (9): 56-61.
- [13] 王永益. 社区公共精神培育与社区和谐善治: 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J]. 学海, 2013 (4): 101-106.
- [14] 方亚琴, 夏建中.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7): 64-84.
- [15] 李梦莹. 社会资本培育视域下的社区治理创新: 本质蕴涵与实践进路 [J]. 学习与探索, 2017 (8): 57-63.
- [16] 赵罗英, 夏建中. 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以北京市 D 区为例 [J]. 学习与实践, 2014 (3): 101-107.
- [17] HANIFAN L J. 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 [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16, 67 (1): 130-138.
- [18] LANG G, WUNSCH M. Genius of common sense: Jane Jacobs and the story of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J]. Children, Youth and Environments, 2012, 22 (2): 302-305.
- [19]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M] // RICHARDSON J G,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sociology of education.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6: 241-258.
- [20] 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00-321.
- [21] PUTNAM R D, LEONARDI R, NANETTI R Y.

-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3 – 180.
- [22] KAY A. Social capital, the social econom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J].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2006, 41 (2): 160 – 173.
- [23] PUTNAM R D.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J]. The American Prospect, 1993 (13): 1 – 11.
- [24] NAN LIN.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J]. Connections, 1999, 22 (1): 28 – 51.
- [25] 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 (2): 242 – 266.
- [26] GITTELL R, VIDAL A. Community organizing: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8, 14 – 22.
- [27] BABAEI H, AHMAD N, GILL S S. Bonding, bridging and linking social capital and empowerment among squatter settlements in Tehran, Iran [J]. World Applied Sciences Journal, 2012, 17 (1): 119 – 126.
- [28] 黄源协, 刘素珍, 庄俐昕, 等.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关联性之研究 [J]. 公共行政学报, 2010 (34): 29 – 75.
- [29] 古学斌. 道德的重量: 论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实践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3): 67 – 78.
- [30] MCNIFF J. Action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M]. London: Routledge, 2013: 71 – 84.
- [31] SUSMAN G I. Action research: A sociotechn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M] // MORGAN G. Beyond method: Strategies for social research. California: Sage Newbury Park, 1983: 95 – 113.

The Co-construction of Bonding and Bridging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 Action Study Based on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Communities Relocated to Alleviate

MA Ye¹, WANG Ying²

(1.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ijing C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e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ject of establishing street social work and volunteer service stations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this action research aims to examine how to develop social capitals among relocated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oretical tools and practice models through joint action with the work team of H Street social work and volunteer service station in H Coun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s can help develop bridging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via psychological recovery and neighborhood construction, and can help develop bonding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via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guidance and community acti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is a gradual and two – way interactive growth process of bonding and bridging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s, and an accumulation of three interdependent and interacting factors as well: trust,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community consensus. As the relocated people establish trust with each other, reconstruct relationship network in the community, reshape the community consensus of reciprocal sharing, develop their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form a new community, they will gradually integrate into the resettlement community by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e new environment becomes more suitable as the overall community welfare is improved, and thus the goal of transitioning from moving out to stable living is realized.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ction research

(责任编辑 冯庆福)